

【历史研究】

论汝颖奇士

杨文春

摘要:以“才策谋略”等为核心特质的汝颖奇士,在声名卓著于汉末曹魏时期时已具有地域性文化符号的意义。魏晋南北朝时期,汝颖地区在政治、经济、文化诸层面发生了重大变化,因而对后世文本中诸如“汝颖固多奇士”之说,可按分类的方式具体辨析其差异:其一,仅是后世的追忆之说,与当时、当地之社会情态少有直接关联;其二,属于附会之说,即后世的汝颖奇士与汉魏之际的汝颖奇士相比已有显著差异,主要体现在时空错位、奇士不奇、文武殊途等方面。追究不同历史时期汝颖奇士的嬗变过程,至少需要从地域社会变迁和历史记忆两个角度来分析。

关键词:汝颖奇士;地域社会;历史记忆

中图分类号:K2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21)04-0129-08

《三国志》有一段曹操与荀彧的对话:“先是时,颖川戏志才,筹划士也,太祖甚器之,早卒。太祖与荀彧书曰:‘自志才亡后,莫可与计事者。汝颖固多奇士,谁可以继之?’彧荐嘉。召见,论天下事。太祖曰:‘使孤成大业者,必此人也。’”目前可见,这是“汝颖多奇士”之说首见于史籍,是汝颖奇士作为一个集合名词首次出现。与之直接相关或由其衍化而来的还有“颖川多奇士”“汝南多奇士”“汝阴多奇士”等。秦汉以来,奇士一词常见于文献记载。按地域论,以燕赵奇士、汝颖奇士最为后世所熟知,甚至具备了地域性文化符号的意义;^①就时段而言,汉魏之际是汝颖奇士作为地域性文化符号形成的关键时期,在后世各类文本中,“汝颖多奇士”之说所体现的历史记忆,几乎都要追溯于此。今人对汉魏之际“汝颖奇士”的关注,仍有讨论空间。比如奇士之“奇”具体(或曰核心特质)为何?诸家之说尚有分歧^②。魏晋以后,诸如“汝颖固多奇士”之语常见于各类文献,对此又该作何理解?是否可与汉魏之际的汝颖奇士等同视之?细究之下,汝颖奇士一词的指代对象、空间所在等连带属性,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可一概而论。笔者拟结合汝颖两地社会文化之变

迁,侧重于历史记忆视角,通过较长时段(以汉魏至唐宋时期为主)对此问题作一考察,略陈己见。

一、曹魏之前“汝颖”与“奇士”的界定

“汝颖”并称见于史籍,其指代主要有两种:一是指汝水、颍水流域地区,包括今河南省周口、漯河、驻马店、许昌和安徽省阜阳等地,大部分属淮河上游;二是作为汝南郡、颍川郡两政区(同属东汉曹魏时期的豫州)的合称或代称。^③豫州是东汉曹魏时期的文化兴盛之地,而汝南、颍川二郡更是名士荟萃。^④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政区设置变动繁复(尤其是南北朝),作为南北对峙前沿的一部分,汝南、颍川两地深受其影响,不过,汝南、颍川作为政区名称一直得到保留。隋大业三年(607)和唐天宝元年(742)改州为郡,汝南、颍川继续成为该区正式的州郡级政区名。虽然无法对文献中所有汝颖奇士的所处位置做出准确判定,但能肯定,在多数情况下并非泛指汝水、颍水流域,而是专指自秦汉以来具有政区意义的空间所在。这一点在汝颖名士、汝颖奇士名誉天下的东汉曹魏时期体现得最直接。

奇士一词的内涵并不固定,时人对其界定带有

收稿日期:2017-12-20

作者简介:杨文春,男,信阳师范学院历史文化学院讲师,历史学博士(信阳 464000)。

很强的主观性。大体而言,在德行、政治、军事、文艺、医术、方术等方面具有超常的才智或技能,就可能被称为该领域的“奇士”,甚至稍具才华、才能者也会得到“奇士”之誉,故而不乏名不符实者。《辞源》即将“奇士”宽泛地解释为才能出众的人,并以陈平为例:“项王不能信人,其所任爱,非诸项即妻之昆弟,虽有奇士不能用,(陈)平乃去楚。”^⑤这里的奇士即指具有政治、军事等方面才能的人。蒋济说:“然则考功案第,守成之法也;拔奇取异,定社稷之事也。”^⑥所谓“奇”与“异”,乃指在政治、军事谋略等方面具有过人之处。

从曹操“汝颖固多奇士”一语的字面意思推断,汝颖奇士早已有之,且广为人知,甚至可以推测,汝颖地区之于奇士已具有“地望”属性。不过,在此之前的传世文献中未见有汝颖奇士的相关记载。如果曹操之说成立,在此之前(尤其是东汉时期),汝颖地区的哪一类人可被称为奇士呢?

颍川地区很早就以多奇士知名于世。《汉书·邹阳传》载齐人邹阳之语:“邹鲁守经学,齐楚多辩知,韩魏时有奇节。”^⑦颍川正属于韩魏之地,袁宏《后汉纪》恰好有一段关于颍川奇士的对话,可作为对“韩魏时有奇节”之说的进一步注解。据载,安帝永初年间,京兆杜陵人朱宠任颍川太守,以正月岁首宴赐群吏,问功曹吏郑凯:“闻贵郡山川多产奇士,前贤往哲,可得闻乎?”答曰:“鄙郡炳嵩山之灵,受中岳之精,是以圣贤龙蟠,俊乂凤集。昔许由、巢父耻受尧禅,洗耳河滨,重道轻帝,遁也高跣。樊仲父者,志洁心遐,耻饮山河之功,贱天下之重,抗节参云。公仪、许由,俱出阳城。留侯张良,奇谋辅世,玄算入微,济生民之命,恢帝王之略,功成而不居,爵厚而不受,出于父城。胡元安体曾参之至行,履乐正之纯业,丧亲泣血,骨立形存,精诚洞于神明,雉兔集其左右,出于颍阳。彪义山英姿秀伟,逸才挺出,究孔圣之房奥,存文武于将坠,文丽春华,辞蔚藻绩,出于昆阳。杜伯夷经学称于师门,政事熙于国朝,清身不苟,有于陵之操,损己存公,有公仪之节,以荣华为尘埃,以富贵为厚累,草庐蓬门,藜藿不供,出于定陵。”^⑧郑凯所说的这几位颍川奇士,不仅时间跨度极长(从尧舜时代到东汉),而且没有一个统一的衡量标准。由此也可看出,这些奇士的核心特质(可以理解为“奇节”)各不相同。

在东汉之前,颍川地区有“多产奇士”之名,汝

南地区未见有奇士之记载,这种不匹配的情况到了东汉中后期才开始发生变化,其直接原因是汝南郡政治、经济、文化地位在东汉时期的迅速上升,以及在此基础上汝南士人的崛起。作为一个具有鲜明地域标识的集合名词,汝颖奇士和汝颖名士至此才有活跃于历史舞台的可能。

东汉一代,汝颖地区以盛出名士为世人所知。顺帝(126—144年在位)以后,儒风不竞,士人兴趣由学术转向政治,汝颖名士趁势而起,雄居士林之首。^⑨他们与宦官势力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莫不有“澄清天下之志”^⑩。在斗争中产生的“三君”“八俊”“八顾”“八及”“八厨”等党锢核心人物中,汝颖名士占据重要地位。但名士并不直接等于奇士,在此阶段,汝颖名士的奇士风范只能通过其卓然的政治品格、尚名节的品行等方面来体现,如“言为士则,行为世范”,“有澄清天下之志”的陈蕃,“风格秀整,高自标持,欲以天下名教是非为己任”的李膺等人。^⑪若果真如此,不仅能解释为何魏晋时代对汝颖地区存有“固多奇士”的历史记忆,也有了将汝颖奇士的渊源追溯于该时期汝颖名士的可能性。时至明代后期,冯琦以东汉汝南汝阳袁安等人为例,有“汝南故多奇士”^⑫之誉,此说不见于汉魏时期的文献。冯琦可能对名士、奇士没有一个明确的界定,故称袁安为奇士。不过,袁安是以政治才能和名节操守名重一时,与活跃于汉末政治舞台上的汝颖名士多有可比之处。司马光编撰《资治通鉴》时一并论赞之:“自三代既亡,风化之美,未有若东汉之盛者也。及孝和以降,贵戚擅权,嬖幸用事,赏罚无章,贿赂公行,贤愚浑殽,是非颠倒,可谓乱矣。然犹绵绵不至于亡者,上则有公卿、大夫袁安、杨震、李固、杜乔、陈蕃、李膺之徒面引廷争,用公义以扶其危,下则有布衣之士符融、郭泰、范滂、许邵之流,立私论以救其败。是以政治虽浊而风俗不衰,至有触冒斧钺,僵仆于前,而忠义奋发,继起于后,随踵就戮,视死如归。”^⑬又有元人刘祁在司马光论赞基础上的精炼评价:“及桓、灵之世,朝政淆乱,奸臣擅权,士风激厉,以敢为敢言相尚,故争树名节,袁安、杨震、李固、杜乔、陈蕃之徒抗于朝,郭泰、范滂、岑晷、张俭之徒议于野,国势虽亡,而公议具存,犹能使乱臣贼子有所畏忌。”^⑭以此观之,若依据后人对名士、奇士的模糊界定(如冯琦),以及对袁安与东汉后期汝颖名士整齐视之的评论(如司马光、刘祁),将其中一部分汉

末汝颖名士称为奇士亦不为过。汉魏之际汝颖奇士的名士渊源也由此可以解读出一二。

上文指出,依据现存东汉末年之前的史料,不见关于汝颖奇士的直接记载,故而对该时期出现的“汝颖固多奇士”一语之意涵,至少可做两种可能性解读。其一,“固多”一词可以理解为是曹操等后人的过誉乃至虚指、附会之称,从历史记忆角度来看,这属于常见现象。不仅奇士,即使是名士,在汉魏时期多有名不符实者,明确被誉为汝颖奇士者更是鲜见。其二,在东汉之前,“颍川奇士”为史籍所常见,而“汝南奇士”则未见,所谓“汝颖”并称,实乃一虚一实,即汝颖奇士名录里只有颍川奇士,与汝南无关联。汉末魏晋时期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叫法,可能是受到东汉时期汝颖名士所享有的极高声誉的影响,以至于模糊(忽略)了名士与奇士之间的界限。

自汉魏之际传布开来的汝颖名士、汝颖奇士,并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士人共同体或曰同质化群体,因为自先秦以来,汝南、颍川的地域文化差异一直存在,没有因为秦汉以来的大一统而消弭。两地在战国、秦汉时期的差异,通过对比《史记·货殖列传》《汉书·地理志》的记载即可明了。东汉中后期,虽然豫州汝、颖两地士人之间的联系因文化交流和政治斗争而日趋紧密,^⑮汝颖并称由此具备了事实依据,但并不必然表示其地域文化面貌可一体视之。事实上,二者地域文化的差异一直很明显,是故当时陈群与孔融会就此而发生争辩,并直接促使《汝颖优劣论》的产生。^⑯

二、魏晋南北朝时期“汝颖奇士”内涵的蜕变

汉魏之际,天下纷争,曹操“唯才是举”,意欲“任天下之智力”^⑰以平天下,在其周围集结的谋士群体中,颍川士人占据重要地位,如荀彧、戏志才、荀攸、荀悦、郭嘉等,“戏志才、郭嘉等有负俗之讥,杜畿简傲少文,皆以智策举之,终各显名”^⑱。“程昱、郭嘉、董昭、刘晔、蒋济才策谋略,世之奇士。”^⑲不难看出,这些奇士的核心特质是“才策谋略”,在曹操的谋士阵营中,颍川奇士可谓独当一面,汝南士人则因其政治取向等原因而鲜见踪迹。

刘劭撰《人物志》一书,专门辨析、品评人物,依照不同的才性,将人物分为三类十二才,上述“才策谋略”之奇士属于以谋术之才为核心特征的“术家”：“思通道化,策谋奇妙,是谓术家,范蠡、张良是

也。”^⑳其后刘劭进一步阐释：“术家之流,不能创制垂则,而能遭变用权,权智有余,公正不足,是谓智意,陈平、韩安国是也。”“计策之能,术家之材也。”“策术之政,宜于治难,以之治平则无奇。”“术谋之人,以思谋为度,故能成策略之奇,而不识遵法之良。”^㉑刘劭在这里特别指出“术家”的“计策之能”主要体现在“遭变”“治难”之时,而汉魏之际的乱世正当其时。以此为参照,虽然奇士的范围、种类偏于宽泛,但可将汝颖奇士之“奇”界定在善谋略的政治、军事才能方面,属乱世之才,其核心特质已非此前“党争”时代的“尚名节”之类。今人言及汝颖奇士,常将其纳入名士群体一并讨论,较少注意两者的不同。或可说,“才策谋略”的“奇士”们,是在尚名节的汝颖名(奇)士逐渐淡出历史舞台之时继之而起,并延续了汝颖士人自东汉以来扮演重要政治角色的传统,将这一嬗变过程理解为名士的奇士化亦未尝不可。若仅就汉魏之际奇士的基本特征而言,前揭诸人之中以卫广来和张宪光的界定较为接近,但二人或忽略或割裂了汉魏之际汝颖奇士在东汉党锢时期的名士渊源。^㉒盖因汝颖奇士之名在汉魏之际最为显著,以致后世多记住了“汝颖”与“奇士”的固定组合形式,而忽略了“奇士”一词在特定时空(汉魏之际)所具有的核心特质。

有人针对性指出：“根据社会潮流、政治环境的变动,汝颖地区士人在不同时期在才能和品行方面呈现出不同的偏重点和突出面。”^㉓汉末魏初一部分汝颖名士的“奇士”化,既可视为其继由学术转向政治之后,汝颖名士风范的二次转化,也是东汉名士群体在汉末政治、社会大变动之下发生蜕变的结果之一。^㉔故当时张彦真“汝颖巧辩,恐不及青徐儒雅也”^㉕之说不足为怪。已有多人指出汝颖奇士在这一时期名不符实,主要因为出自汝南郡的奇士不仅在数量上远少于出自颍川郡者,还在于这一群体正快速地走向沉寂。颍川因曹操“都许”之举,其政治、文化地位尚能维系一时,本地士人故能得到进用,^㉖以致汝颖奇士有被“颍川奇士”取代之势。在短祚之西晋,汝南士人尚能得到源自汉魏之自然延续;在南北对峙时代,汝南郡因长期处于战争前沿阵地,其经济、文化与社会难以摆脱持续衰退和动乱之局面。汝南士人的沉寂,昭示汝南郡自两汉以来,尤其是在东汉一代形成的政治、文化重心地位已逐渐丧失。

中原因“永嘉之乱”再遭劫难后,颍川士人也开始走向萧条,但仍略胜于汝南士人。《晋书》载:“庾氏世载清德,见称于世,汝颖之多奇士,斯焉取斯。”^{②⑦}“清德”该做如何理解?日本学者上田早苗强调该时期的“清”是一种在野的生活方式,魏晋以后的贵族制度及贵族文化都以“清”作为基本要义。^{②⑧}《晋书·庾峻传》借魏散骑常侍苏林之口赞誉庾峻一族:“尊祖高才而性退让,慈和汎爱,清静寡欲,不营当世,惟修德行而已。”^{②⑨}结合相关记载,或由此可知,“清德”乃是对“清静寡欲”“惟修德行”等道德品行、生活方式的概括。时人刘劭的《人物志》对“清节”的界定也有助于理解“清德”:“若夫德行高妙,容止可法,是谓清节之家。”“夫清节之业,着于仪容,发于德行;未用而章,其道顺而有化。故其未达也,为众人之所进;既达也,为上下之所敬。其功足以激浊扬清,师范僚友。其为业也,无弊而常显,故为世之所贵。”^{③⑩}作为清节之业的主要特征,“德行高妙,容止可法”与“着于仪容,发于德行”所表达的意思无异,是对内(德行)、外(容止、仪容)两个层面的要求。可见,此时以“清德”为“奇”的所谓汝颖奇士,与汉魏之际大不相同,后世比附二者,有牵强之嫌。^{③⑪}类似的还有在西晋重振“雅道旧风”的汝南安城人周顛。“司徒掾同郡贡嵩有清操,见顛,叹曰:‘汝颖固多奇士!自顷雅道陵迟,今复见周伯仁,将振起旧风,清我邦族矣。’广陵戴若思东南之美,举秀才,入洛,素闻顛名,往候之,终坐而出,不敢显其才辩。顛从弟穆亦有美誉,欲陵折顛,顛陶然弗与之校,于是人士益宗附之。州郡辟命皆不就。”^{③⑫}周顛所振起之旧风指雅道,主要体现在德业、节义、品行等方面,^{③⑬}与称誉庾氏一族的清德有共通之处。显而易见,有雅道旧风的周顛被称为“奇士”不同于汉魏之际“才策谋略”的汝颖奇士。《世说新语》引《晋阳秋》亦有相同记载:“(周)顛有风流才气,少知名,正体巍然,侪辈不敢媒也。汝南贡泰渊通清操之士,尝叹曰:‘汝颖固多贤士,自顷陵迟,雅道殆衰,今复见周伯仁。伯仁将祛旧风,清我邦族矣。’”^{③⑭}其中有值得注意的一字之差,即《晋书》“汝颖固多奇士”一语在《晋阳秋》中是“汝颖固多贤士”。以“风流才气”“正体巍然”“清德”“雅道”等为基本特征的“贤士”较为接近“名士”之内涵^{③⑮},称誉以“清德”等显名的周顛为“贤士”比“奇士”更为合适^{③⑯}。他们不仅与东汉后期有突出政治作为或“奇节”风

范的名士不同,更不属于最广为人知、在汉魏风云际会之际“才策谋略”的汝颖奇士一类。由汝颖固多“奇士”变成汝颖固多“贤士”,或许也宣告了真正“汝颖奇士时代”的结束。尔后北方再次陷入长期战乱,汝颖地区成为“蛮”“亡命”“流民”等社会边缘势力的聚集区。^{③⑰}其地域社会环境、文化面貌与两汉时相比,已不可同日而语,在这片乱世的土壤里很难再有如昔日应时而起之奇士。时至后秦,从羌人雄主姚兴(366—416年)“古人有言”,“汝颖多奇士”的话语中,^{③⑱}隐约能感受到后人对汝颖奇士已成为过去的追忆。易言之,后世所见之汝颖奇士,或是追忆,或是附会,不仅不能径直与汉魏之际等同视之,^{③⑲}还日益模糊了汝颖的空间所在和奇士的核心特质。

三、唐宋时期“汝颖”与“奇士”的变异

由汉末开始持续数百年的社会大动乱,处于南北战争前沿地带的汝颖地区的社会经济长期遭受破坏,曾经作为文化发达表征的士人群体难觅踪迹。汝颖奇士成为后世追念的地域性符号。以两方隋代墓志为例:“公讳威,字永兴,河南洛阳人也。”“公禀秀降生,含章挺出。峰仞孤竦,气调不群。幽并少年,遥推游侠;汝颖人物,远谢多奇。”“君讳叔明,字慈尚,吴兴长城人也。”“源与颍川同”,“汝颖人物,许洛名流。世蕴奇伟,时标秀杰”。^{④⑩}汝颖人物“远谢多奇”“世蕴奇伟”等语,既是牵强附会地溢美于墓志主,也包含了一层对过往时代的追忆性色彩。到了唐宋时代,汝颖奇士已是夹杂着错位与变异的地域性文化符号,常常可见奇士不“奇”、此“汝颖(州)”非彼“汝颖(川)”等情况。以《唐故史(待宾)府君墓志铭》为例:“其后又授(史待宾)颍州汝阴县令。汝颖多奇,人吏尚譎。公大敷善诱,潜察奸讹,赏罚既明,比户咸若,州课第一,县异有三,字人如子,系公是赖。”^{④⑪}唐宋时期的颍州在两汉时属汝南郡,西晋泰始年间将其分置为汝阴郡(今安徽阜阳),即后来的颍州。“汝颖”之颍川郡,于“(东魏)天平初置颍州,治长社城(今河南长葛东),武定七年(549)改治颍阴城”^{④⑫},时属郑州,隋唐时称许州,一度改称颍川郡,未曾复名颍州。上引《唐故史府君墓志铭》中“汝颖多奇”之“颖”乃指颍州(今安徽阜阳),而非时称许州的颍川(今河南许昌)。欧阳修知颍州时,苏辙献诗誉曰:“公居颖水上,德与颖

水清。”“汝颖亦多士，后来非老成。”^④又如略早之王臻：“颖州汝阴人。始就学，能文辞。曾致尧知寿州，有时名。臻以文数十篇往见，致尧览之，叹曰：‘颖汝固多奇士。’”^⑤汉魏时期的“汝颖”分指汝南郡和颍川郡，而以上三例“汝颖”乃是汝南郡（其时应称豫州或蔡州）与颍州（今安徽阜阳）之合称。不过，北宋时的颍州也是一个文化重地，“自庆历以来，贤士大夫往往经营其处，以为闲燕之地”^⑥。在后世地方文献所见“古称汝阴多奇士”^⑦之“古”，乃指汉魏之际而非北宋。唐宋时期的汝阴郡（颍州）属于东汉汝南郡的政区范围，此“汝阴多奇士”乃由“汝颖多奇士”衍生而来。地域社会的文化符号是历史层累造就的产物，未必会受到行政区划人为分割的影响。后人对此地域相关人物誉之以“汝颖奇士”或“汝阴奇士”，虽有附会之嫌或牵强之处，也在情理之中。

在隋唐时期稍显落寞的颍川郡（许州），到了北宋，文化名气颇大，文人贤士众多，并形成了地域性文人集团，在社会上有一定的地位和影响。^⑧在同时期的蔡州，朝廷或是批准立学，或是赐学田，规模越来越大。教育事业得到重视的直接结果是科举士人数量的增多。绍兴十年（1140），岳飞班师蔡州，“有进士数百辈”，“岔集于庭”。^⑨因临近全国文化中心东京，北宋蔡州、颍州和许州的文化地位有所复兴。这一时期，既有蔡州（汝南郡）与颍州的搭配，也有颍川郡（许州）与北宋文化中心之一西京洛阳的组合，乃有“许洛之间，极多奇士”^⑩等语。可见，“汝颖”的空间所在一直处于变化之中。

在汉魏之际汝、颖两地的奇士中，汝南郡奇士在数量上处于相对少数。在目前可见、已发生蜕变的数例唐宋时代“汝颖奇士”中，或是来自颍川郡，或是出自颍州，仍鲜有出自汝南郡者。^⑪在隋唐一统时代，全国文化中心重新稳定在黄河中下游流域，其紧邻之地蔡州却未能复起。与东汉时汝南郡的文化重心地位相比，两者有天壤之别。唐代汝南郡文化之落后与士人之凋敝，由两《唐书》本籍士人列传之少可见一斑。^⑫任华《送李侍御充汝州李中丞副使序》一文可能是对汝南奇士被遗忘、被错位的最好注解：“华州、汝州，两京股肱郡也。”“汝颖自古颇多奇士，荀陈令族，岂无子孙？君其善待之，无忘推迁。”^⑬其一，任华以“荀陈令族”来例证“汝颖自古颇多奇士”，但荀氏、陈氏皆出自颍川，与汝南无关。其二，

因汝州毗邻许州，疑任华所谓“汝颖”之“汝”并非汝南，而是将其错位于汝州。若是如此，则时人任华对汝颖奇士在地理空间上的认知，与汉魏之际相比较，已出现明显偏差。从行政区划上看，唐代汝州之境的大部分在东汉时属南阳郡，与汝南、颍川二郡几无关联。

前文指出，汝颖奇士的本原是指乱世之才，他们活跃于汉末曹魏时期，后人不仅记住了这个时代的印记，为与之契合者贴上汝颖奇士的标签，还试图对此历史现象给出相应的解释。如唐末乱世时，“山南西道节度使杨守亮忌利州刺史王建骁勇，屡召之，建惧，不往。前龙州司仓周庠说建曰：‘唐祚将终，藩镇互相吞噬，皆无雄才远略，不能戡济多难。公勇而有谋，得士卒心，立大功者非公而谁！然葭萌四战之地，难以久安。阆州地僻人富，杨茂实、陈、田之腹心，不修职贡，若表其罪，兴兵讨之，可不战而擒也。’建从之。部将张虔裕说建曰：‘公承天子微弱，专据方州，若唐室复兴，公无种矣。宜遣使奉表天子，杖大义以行师，蔑不济矣。’部将綦毋谏复说建养士爱民以观天下之变。建从之。庠、虔裕、谏，皆许州人也。”胡三省随后解读到：“汝颖多奇士，自古然也。史言英雄角逐，天必生人才以羽翼之。”^⑭以善军事谋略为特征的谋士是奇士群体中常见的一类，“在唐尤多”。宋人洪迈专论之：“天下未尝无魁奇智略之士，当乱离之际，虽一旅之聚，数城之地，必有策策知名者出其间，史传所书，尚可考也。”“后世至不可胜纪，在唐尤多。”^⑮关于奇士出现的时代背景，胡三省、洪迈所言无异。天下离乱之际，必不乏“魁奇智略之士”。从上引《资治通鉴》文可知，胡三省将来自许州的周庠、张虔裕、綦毋谏三人附誉为汝颖奇士，主要是基于他们能够给王建出谋划策。他们与汉末魏初同属乱世之才的汝颖奇士虽有相似之处，不同之处也很显著，即汉末魏初者可寻觅出名士渊源，而唐末五代者多为军将出身。以时代背景看，前者活跃于名士时代，后者处于武人的时代；以文武之别看，前者属文，后者尚武。唐末五代汝颖地区的所谓“奇士”实际上是蔡（汝南郡）许（颍川郡）军人群体的一部分^⑯。奇士与蔡许军人牵强附会在一起虽使出现地理空间错位的“汝颖”回归本原，但奇士之属性却发生了由文转武的蜕变。^⑰

继汉魏之际出现“才策谋略”的奇士后，汝颖地区能够再次群起“羽翼”之才（蔡许军人群体），地域

性因素不可忽视。唐后期的淮河上游地区既是战争多发地带,也是寇盗、江贼等社会边缘势力的聚集区。追溯既往,在南北朝对峙时期,汝南、颍川等郡所处的“中间地带”,长期是“荒人”“亡命”“蛮”等社会边缘势力活动的重要场域。这种地域社会环境俨然不具备“文”之属性,无法培育出类似汉魏时的名士型奇士,反倒适宜“武”人的成长。安史之乱末期,河北平卢军人能够成功入主淮西镇(治蔡州),进而割据一方、与中央分庭抗礼 30 余年,与此地域的社会基础有不可忽视之关联。在平定淮西镇割据后不久,蔡州军人被并入忠武军^⑤(治许州)。蔡州上蔡人(一说许州人)秦宗权正是凭借忠武军起家,以蔡州为叛乱中心,在唐末一度不可一世于中原,乃为朝廷巨患。秦氏之乱败,大批蔡许军人南下,在唐末五代南方割据战争中继续扮演“羽翼”之才的角色,如上文例举之周庠、张虔裕、綦毋谏等人。^⑥

四、余语

“汝颖多奇士”“汝颖固多奇士”“汝颖自古多奇士”等,常见于宋代以后的文献,其中又以方志(不限于汝颖地区)最为集中。这类记载一般与其时代、其地域已无直接关联,大多都是后世对前世层累地传承下来的追溯记忆,不能以之来说明当时、当地的社会情态。实际上,早在南宋绍兴二十七年(1157),道州州学教授郭份在彰扬周敦颐的《道州进士题名记》一文中,批评过这种现象:“然世之士大夫类以地望论人物,汝颖多奇士、山东多相家,盖泥纸上语。”^⑦在多数情况下,不论是靠口口相传还是赖文本传世的这一类地域性文化符号,更适合将其作为地方记忆或历史典故来界定。

有史以来,中国文化的地区性、时代性差异显著,具体到某一地域社会文化之荣枯兴衰,实属常见。汝颖奇士之蜕变仅是其中一例。宋人罗大经在《鹤林玉露》书中已由物及人地指出这一点:“余闻秦中不产竹,昔年山崩,其下乃皆巨竹头。由是言之,古固产竹矣。”“盖非特物然也,巴邛、闽峤,夙号荒陋,而汉唐以来,渐产人才,至本朝益盛。古称山西出将,山东出相。又曰汝颖多奇士,燕赵多佳人,其说拘矣。”^⑧“物产不常”多由自然因素所致,一地区人才(将、相、奇士、佳人等)之兴废则多受政治、经济、战争等因素影响。汝颖奇士的出现频率、蜕变因由等都能从中找到线索。

综上所述,在汉魏之际的历史大变动时期,可追溯出汉末名士渊源的汝颖奇士主要以“才策谋略”著称于世。由于汉末以后该地区长期陷入战乱,曾经显要的政治、文化地位迅速衰落,汝颖士人不可避免地走向凋零。西晋以后,依然可见的汝颖奇士,一般都是追忆或附会前者,二者迥然有别,如在西晋、隋及唐前期、北宋的统一时代,或是出现汝颖的空间“错位”,或是奇士之内涵转向“清德”品行、文艺才华等。唐末五代乱世的汝颖奇士虽已回归到最初的地理空间,但奇士之内涵发生了根本性改变。秦宗权逆乱及此后,大批汝南、颍川军人登上割据战争的历史舞台,其中偶能出谋划策者被冠以汝颖奇士之称。蔡州等地自魏晋以后在文化上长期边缘化,且浸淫犷戾尚武之风俗,难以再具备滋养东汉名士(奇士)的土壤。胡三省所谓之汝颖奇士是奇士一词泛指滥用的结果。从汉魏到唐宋之际的汝颖奇士,唯一未变的是出自颍川者一直多于汝南者。

北宋定都开封,全国政治、文化中心在东汉以后再次重合于中原,汝颖地区在其辐射之下出现文化复苏迹象,一度是文人汇聚之地。好景不长,随着宋室南迁,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皆远中原而去。日趋没落的汝颖地区,无论是和平抑或动荡时期,即使是变异的汝颖奇士也少见史册。见载于其他地区方志等文献的汝颖奇士,无非是对先前时代汝颖地区社会文化符号的记忆或复述,几无实际内涵。当然,也可见其带来的绵延影响力。汝颖奇士蜕变背后折射出的地域社会变迁意义即在于此。

注释

①例如唐代刘知几《史通》在杂述“郡书”时言:“汝颖奇士,江汉英灵,人物所生,载光郡国,故乡人学者,编而记之。”“周斐《汝南先贤》”,“此之谓郡书者也”。见浦起龙释《史通通释》卷一〇《杂述》,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274页。郡书难免有“矜其州里,夸其氏族”之嫌,但其基本功能还是在于记郡国乡邦先贤、耆旧节行人物及文化、风俗民情,实为一方之人物志。又如明代赵时春《送韩府长史乔水致仕新野序》在赞誉河南之地时有言:“汝淮之滨,晋魏奇士之所由集也。地势雄拔而山水秀杰,故其产多君子。”见赵时春《赵浚谷诗集六卷文集十卷》,《四库全书存目丛书》87册《集部·别集类》,齐鲁书社,1997年,第261页。关于燕赵奇士的相关问题,笔者拟另撰文论述。②胡宝国《汉晋之际的汝颖名士》(《历史研究》1991年第5期)认为是具有出众政治才能的名士;张永刚《汉晋之际的颍川奇士》(华中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年,第7—8页)认为胡宝国的界定“不太确切”,主张用“谋略出众的士人”来界定;王春芳《汝颖士人及其在东汉末年的流向》(李修松主编:《淮河流域历史文

化研究》,黄山书社,2001年,第488页)认为“奇士”是一个与常士相对的概念,“必须拔奇取异”;卫广来《汉魏晋皇权嬗代》(书海出版社,2002年,第326—328页)认为奇士本指古时通达之士大夫,而曹操部属的“奇士型士大夫”本不以学术取胜,异在奇节奇策冠天下,皆非传统士大夫,其节在大,其策在远,固非俗儒所解;张宪光《“汝颖奇士”那些事儿》(《书城》2014年第9期)在前人的基础上总结出,汉魏之际的“奇士”是指在乱世中“算无遗策,经达权变”、善于治国用兵的杰出人士,与守成之儒生有异。张宪光文虽非学术论文,其解读却颇有可取之处。本文在第二部分(魏晋南北朝时期“汝颖奇士”内涵的蜕变)对这些观点做出回应。^③东汉汝南郡政区的主体范围大致相当于今河南省驻马店和安徽省阜阳两地,约与唐代汝南郡(蔡州)和汝阴郡(颍州)相当。西晋时,汝阴郡(治今安徽省阜阳市)始别置。史籍所见汉魏汝南士人籍贯大部分属于今河南省,其中被称为奇士者亦属之。又,汝南郡治所一直在今驻马店境内。若以此为据,则汉魏汝南郡文化重心之空间范围应主要位于今河南省境内。^④隋炀帝《敕袁宏威崔祖睿》引晋武帝语云:“江东之有吴会,犹江西之有汝颖,衣冠人物,千载一时。”见李昉等《太平御览》卷六〇二《著书下》引《隋大业拾遗》,中华书局,1960年,第2710页。类似称道汝颖人物之记载甚多。汉魏时期汝南、颍川二郡之文化重心地位,详见卢云《汉晋文化地理》,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66—69、114—116、133—134页。^⑤《辞源》(修订本),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788页。^⑥蒋济:《万机论·用奇》,严可均校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三国文》卷三三,中华书局,1958年,第1239页。^⑦班固:《汉书》卷五一《邹阳传》,中华书局,1962年,第2353页。^⑧袁宏:《后汉纪校注》卷一八《顺帝纪上》,周天游校注,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495页。^⑨胡宝国:《汉晋之际的汝颖名士》,《历史研究》1991年第5期。^⑩范曄:《后汉书》卷六七《范滂传》,中华书局,1965年,第2203页。^⑪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卷上之上《德行第一》,周祖谟、余淑章整理,中华书局,1983年,第1、6页。^⑫冯琦:《宗伯集》(万历刻本)卷九《送都谏李君之河南参藩序》,《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十五册),北京出版社,1997年影印本,第147页。^⑬司马光:《资治通鉴》,中华书局,1956年,第2173—2174、8347页。^⑭刘祁:《归潜志》卷一三,崔文印点校,中华书局,1983年,第144页。^⑮刘蓉:《汉魏名士研究》(中华书局,2009年,第16—26页)认为汝南、颍川、南阳三郡在东汉形成了一个更高级的地域文化区——汝颖南阳文化圈。笔者认为称之为“政治文化圈”更为恰当。^⑯胜村哲也《後漢における知識人の地方差と自律性》围绕孔融该文就汝颖士人在汉末的转向问题有过集中讨论,见中国中世史研究会编《中国中世史研究——六朝隋唐の社会と文化》,东海大学出版会,1970年,第79—96页。余英时《汉晋之际士之新自觉与新思潮》则指出,士大夫之地域分化,为当时士之内在分化之一重要层面。见《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62页。若据《史记·货殖列传》与《汉书·地理志》所载,汝南、颍川二地一直未属于同一文化区。^⑰陈寿:《三国志》,中华书局,1964年,第26、462页。^⑱陈寿:《三国志》,中华书局,1964年,第262页。又可见范曄《后汉书》卷七〇《荀彧传》(中华书局,1965年,第2284—2285页)之说:“操每征伐在外,其军国之事,皆与筹策焉,彧又进操计谋之士从子攸,及钟繇、郭嘉、陈群、杜袭、司马懿、戏志才等,皆称其举。”^⑲刘劭:《人物志》卷上《流业》,《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48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766页。^⑳分见刘劭《人

物志》卷上《流业》、卷中《材能》、卷中《接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48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766、771、773页。^㉑牟发松《侠儒论:党锢名士的渊源与流变》(《文史哲》2011年第4期)认识到这一点:“党锢事件之后的汉末魏晋之际,士林的主角渐渐换成魏晋名士,政治的主角则是其中的有权谋者,因为刚刚过去的历史以鲜血昭示:政治、军事斗争不同于清议,不能‘口舌’,权谋和策略才是最重要的。这是汉魏之际谋略之士辈出的历史背景。”更早有陈启云《颍川荀氏家族》(《六朝文化·社会·制度:中华中古前期史研究》,新文丰出版公司,1997年,第75—88页)一书,以荀氏为中心指出党锢事件之后士人的三个活动去向,其一是结交地方豪强,并因此卷入政治旋涡,直至投靠曹操。按,据毛汉光《中国中古社会史论》(上海书店,2002年)第118页注释②,陈启云类似之说初见于1964年。^㉒王春芳:《汝颖士人及其在东汉末年的流向》,李修松主编:《淮河流域历史文化研究》,黄山书社,2001年,第488—489页。^㉓李磊《六朝士风研究》(武汉出版社,2008年,第35页)在上揭胡宝国文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当时士大夫普遍转向重视谋略,是汉末三国士人历史风貌的重要特征之一。关于汉晋之际名士风貌转变的研究成果甚多,但多着眼于向魏晋名士风范之转变。^㉔房玄龄:《晋书》,中华书局,1974年,第1892、1406—1407、1392、1850、3000页。^㉕唐长孺《东汉末期的大姓名士》分析曹操任用很多颍川大姓、名士的原因为:“与荀彧的推荐有关,同时也因颍川恰巧是新都所在。”见《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中华书局,2011年,第43页。认为汝南士人在政治上衰落的命运来自曹操的镇压的观点亦属多见。关于汉末汝南、颍川二郡士人不同政治取向的研究成果甚多,兹不赘举。^㉖上田早苗:《贵族官僚制度的形成——清官的由来及其特征》,刘俊文主编:《日本中青年学者论中国史(六朝隋唐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1—26页。^㉗分见刘劭《人物志》卷上《流业》、卷中《利害》,《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48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766、772页。^㉘世有治乱,人有常奇,各有所需。从统治者需求角度而言,治世多是守成之常士,该时期所谓之奇士,不可再以“善谋略”等特质为衡量标准。魏晋时期奇士的“清德”转向,或可由魏、晋治国理念的转变窥其一端。晋武帝禅代后,标榜以孝治天下,贯彻儒家礼教德治。见柳春新《汉末晋初之际政治研究》第六章《论晋武帝的治国之策》,岳麓书社,2006年,第224页。^㉙其他类似例子还有,陈寿《三国志》卷三七《蜀书·庞统传》(中华书局,1964年,第953页):“当今天下大乱,雅道陵迟,善人少而恶人多。方欲清风俗,长道业”;李延寿《南史》卷一九《论曰》(中华书局,1975年,第546页):“谢氏自晋以降,雅道相传,景恒、景仁以德素传美,景懋、景先以节义流誉。”^㉚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卷上之上《言语第二》,中华书局,1983年,第92页。^㉛同样具有说服力的例子还有颍川庾道,《魏书》卷七一《江悦之传》第1592页载:“时有颍川庾道者,亦与道迁俱入国,虽不参谋,亦为奇士。历史史传,善草隶书,轻财重义。”据此可知,即使没有善谋略(参谋)之举,能够“历史史传,善草隶书,轻财重义”,也会被誉奇士。故而,庾道这位“汝颖奇士”更适合被称为“汝颖名士”或“汝颖贤士”。^㉜范曄《后汉书》卷六三《李固传》(中华书局,1965年,第2080页)载其上疏之言:“气之清者为神,人之清者为贤。养身者以练神为宝,安国者以积贤为道。”上田早苗认为李固所言“清”即是“贤”,相关分析见《贵族官僚制度的形成——清官的由来及其特征》,刘俊文主编:《日本中青年学者论中国史(六朝隋唐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11页。^㉝近

年来,北村一仁撰有多篇论文讨论到南北朝时期该地区的社会环境和文化生态,主要有:《“荒人”試論——南北朝前期の国境地域》,《東洋史苑》60、61号,2003年,第265—284页;《南北朝国境地域形成過程及びその実態》,《東洋史苑》63号,第76—119页;《论南北朝时期的“亡命”——以社会史侧面为中心》,《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22辑,2005年,第190—208页;《在南北朝国境地域的同姓集团的动向和其历史意义》,牟发松主编:《社会与国家关系视野下的汉唐历史变迁》,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61—294页;《南北朝“渊薮”的地域的分布とその空間的特徴》,《東洋史苑》70、71号,2008年,第146—183页;《南北朝後期潁川地区の人々と社会:石刻史料を手掛かりとして》,《龙谷史坛》129,2008年,第45—81页;《南北朝时期的汝南悬瓠——以“城豪”胡氏的动向为中心》,《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27辑,2011年,第153—169页。此前,陈金凤等人的论著亦有所涉及。^{③⑨}后世追忆之说常见,如元人袁桷等撰《延祐四明志》卷一有言:“先生言未既,公子起而称曰,郑圃泽多贤,卫多君子,鲁东海多卿相,汝颖多奇士。”《宋元方志丛刊》(第六册),中华书局,1990年影印本,第6150页。^{④⑩}分见《全隋文补遗》卷四《姬威墓志》、卷五《陈叔明墓志》,韩理洲辑校编年,三秦出版社,2004年,第248、322页。^⑪周绍良主编:《唐代墓志汇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1367页。^⑫魏收:《魏书》,中华书局,1974年,第2526页。^⑬苏辙:《栾城集》(上)卷四《赵少师自南都访欧阳少师于颍州留西湖久之作诗献欧阳公》,曾枣庄、马德富校点,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84—85页。^⑭脱脱:《宋史》卷三〇二《王臻传》,中华书局,1977年,第10009页。^⑮苏颂:《苏魏公文集》卷六一《少府监致仕王君墓志铭》,王同策等点校,中华书局,1988年,第935页。^⑯同治《颍上县志》卷九《人物》,成文出版社,1975年影印本,第479页。^⑰程民生:《宋代地域文化》,河南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82页。^⑱关于北宋蔡州文化教育方面的情况,见程民生《宋代地域文化》,第162、217页。^⑲马永卿:《嬾真子》卷五《擅入御苑》,“丛书集成初编本”,商务印书馆,1939年,第65页。^⑳《唐故洛州司户参军事格府君墓志铭并序》(志主:汝南郡人格处仁)“词曰”有“聿生奇士,实表宏材”之语,结合志主经历来看,当属溢美不实之辞。见周绍良、赵超主编:《唐代墓志汇编续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276—277页。^㉑史念海:《两〈唐书〉列传人物籍贯的地理分布》,

《唐代历史地理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373—467页。^㉒任华:《送李侍御充汝州李中丞副使序》,董诰等编:《全唐文》卷三七六,中华书局,1983年,第3819页。^㉓洪迈:《容斋随笔·容斋续笔》卷一〇《天下有奇士》,孔凡礼点校,中华书局,2005年,第342页。^㉔胡三省注意到了汉唐两代汝南郡社会文化的不同:“考之汉志,汝南户口为百郡之最,古人谓汝颖多奇士,至唐而犷戾乃尔,习俗之移人也。”《资治通鉴》,第7745页。^㉕与汝颖奇士由文转武相对,一度以慷慨悲歌、侠义风骨为主要特征的燕赵奇士在中古时期也曾以“文”属之。李延寿《北史》卷三三《李灵、李顺、李孝伯传》“论曰”(中华书局,1974年,第1243页):“古人云‘燕、赵多奇士’,观夫李灵兄弟,并有焉。灵则首应弓旌,道光师傅;顺则器标栋干,一时推重;孝伯风范鉴略,盖亦过人。各能克广门业,道风不殒,余庆之美,岂非此之谓乎。”又,魏徵《隋书》卷四二《李德林传》(中华书局,1973年,第1194页):“王(任城王高潜)因遗尚书令杨遵彦书云:‘燕、赵固多奇士,此言诚不为谬。今岁所贡秀才李德林者,文章学识,固不待言,观其风神器宇,终为栋梁之用。’”这一现象应与该时期河北已成为全国文化重心所在直接相关。^㉖关于忠武军在唐后期藩镇体制中的作用与角色,尤其是与许州军人之关系,见黄清连《忠武军:唐代藩镇个案研究》,《“中研院”史语所集刊》第64本第1分,1993年,第89—134页。^㉗曾现江:《唐后期、五代之淮蔡军人集团研究》,四川大学硕士论文,2002年,第49—99页。据曾氏对淮蔡军人集团来源的统计,蔡、许两地军人共占61.2%(第72—79页)。何永成《论秦宗权与蔡贼集团》对秦宗权军事集团成员的来源亦有统计,见(台湾)中国唐代学会研究会主编《第五届唐代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丽水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1年,第453—488页。近年,陈志坚《唐末南方割据中武人的作用》对此亦有揭示和梳理,见孙竞昊、鲍永军主编《传承与创新:浙江地方历史与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浙江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95—104页。^㉘郭份:《道州进士题名记》,周敦颐:《元公周先生濂溪集》卷十,《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集部·宋别集类》,书目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256页。^㉙罗大经:《鹤林玉露·丙编》卷四《物产不常》,王瑞来点校,中华书局,1983年,第300页。

责任编辑:王 轲

On the Ru-Ying Wizards

Yan Wenchun

Abstract: The Ru-Ying wizards (汝颖奇士) with the core attribute of "talents and strategies" were very active and gained their fame from the late Han to Wei (曹魏), when they were regional cultural symbols. The political, economic and cultural domains of Runan and Yingchuan changed greatly during Southern and Northern Dynasties, therefore, the distinctions of "the Ru-Ying wizards" in later texts can be made specifically based on the modes of classification. The first demonstration was that they were just the later generation's remembrance, with no direct connection with the social situation of the time and the place. The second was that they were far-fetched, that is, the Ru-Ying wizards in later generations were very different from those in Han and Wei Dynasties, mainly reflected in the aspects such as the dis-location of time and space, wizards without specialty, and Wen and Wu taking different routes. The transmutation of the Ru-Ying wizards in different times should be studied at least from the two perspectives: the changing of local society and historical memory.

Key Words: Ru-Ying Wizards; local society; historical memory